

从具身在场到虚拟传播：一种乡村治理框架的提出

——基于晋东南C村的案例分析

李红艳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随着乡村数字建设的实践不断深入,针对不同村落以何种方式建构各自的村落治理框架,特别值得关注。研究以晋东南一个传统山村为案例,通过对该村道德银行运行过程的分析,基于评选好人、发现好人、好人在线三个维度,提出再造好人的乡村治理框架。这种乡村治理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社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治理理念在现实层面的融合。最后,对该治理框架所关涉的乡村秩序、行政治理与技术治理等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

【关键词】 好人再造; 虚拟传播; 具身在场; 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20050/j.cnki.xwdx.2024.02.001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随着以新媒体为代表的多元化媒介技术在乡村的扩散,如何使用媒介技术拓展乡村治理路径、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之一。首先,媒体被视为一种社会场景,为乡村治理创造了互动空间。新媒体形式跨越了原有固化的科层组织体系,实现信息之间的“即时性对话”形式(李红艳等,2020;李红艳,2022),营造出一个虚拟的村社共同体空间,村民实现了群体虚拟在场,形成了村民在村落内部和村落外部的多元互动(孙信茹,2016;牛耀红,2018;刘锦程等,2020)。乡村青年群体通过与数字媒体互动,深刻影响着本地乡村结构的文化实践(Pathak-Shelat & DeShano, 2014;

【作者简介】 李红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研究”(21AZD144)的阶段性成果。

Ngonso, 2019)。其次,媒体被视为一种能动性主体,技术赋权功能及参与式治理角色得到关注。重塑乡村治理结构的难点是使乡村民众成为主动、有力的乡村治理主体(李红艳,2020),媒体通过“关系赋权”的形式勾连行动主体,达成主体赋权与社会互动(周孟杰等,2021;Basu & Banerjee, 2011),通过社交媒体的使用,贫困地区的青年人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在经济收入方面更具有优势(Martínez-Domínguez & Mora-Rivera, 2020)。因此,新媒体在农村地区的迅速扩散不仅弥补了农村地域封闭的限制,也有效地促使农村地区公民意识的觉醒(孙贺,2018;沙垚,2020;张淑华等,2020;李俊清等,2020;刘刚,2020)。

尽管媒介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正在进入多元化探索阶段,就乡村治理而言,主要研究则集中在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相关议题上。研究指出,扶贫资源在乡村传递的过程重塑了地方政府的政治生态,构建了一种国家与乡村的文化交往形式(荀丽丽,2017),随着时间推移,在乡村治理模式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如简约治理(许晓,2022)、一线治理(杜鹏,2020)、科层治理(董磊明、欧阳杜菲,2023)等,乡村治理呈现出超常规的社会动员形式,其最终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最终取决于这一社会实验如何通过制度化得以完善(王晓毅,2020)。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学者普遍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一种城乡融合理念,而这种理念将贯彻在中国农村改革深化、城乡要素市场统一、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统一等方面(廖彩荣等,2017;王立胜等,2018;唐任伍,2018;张海鹏等,2018;叶兴庆,2018)。“三治合一”标志着乡村治理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治理模式从村民自治走向多元共治、治理内容不断丰富、治理机制不断创新的局面中。通过“三治合一”,乡村振兴从基层治理的角度推进城乡有效融合,从而使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成为可能(蔡文成,2018;邓大才,2018;袁金辉等,2018;何阳等,2018;霍军亮等,2018;张新文等,2018;张瑜等,2018;丁志刚等,2019;吴成林,2019;朱政,2022)。

现有研究或侧重贫困治理,或集中论及媒体或者新媒体对于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媒介治理三个维度的动态背景出发,探究乡村治理框架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基于此,本研究的议题是: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实施和持续推进,乡村治理是否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信息融合中,借助媒介^[1]形成了新的治理框架?这种新的治理框架如何实现了“创新”?

二、案例村选择与研究资料的获取

C村位于吕梁山南部,距离县城8公里。共有363户1174人,下辖6个自然村。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户144户470人,贫困发生率为40%^[2]。2016年该村实现整村脱贫摘帽,进入乡村振兴阶段,2019年开始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由于村落附近有铁矿、煤矿,村民看

山吃山，日子过得富裕。随着小矿山被陆续取缔，C村村民闲了下来，无事生非，导致C村在周围村落里名声很差。但是，在脱贫攻坚战略实施及其完成过程中，C村成为各大媒介争相报道和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典型村落，因此对该村落的研究具有了较好的示范意义和学术价值。

研究资料来源：（1）县镇村各级政府提供的各类资料。包括：各级政府年度总结报告、各级政府扶贫总结报告、各级政府典型事例汇总报告、各级政府提供的资料中与道德银行案例相关的资料。（2）参与式观察与入户走访资料。2019年9月初，笔者到该县、该镇和该村实地调研1周时间，调研期间与县干部、镇干部和村干部分别进行了访谈，入户走访了村里的好人家庭代表、村落精英和普通农民。（3）深度访谈资料。深度访谈对象如表1所示。（4）网络访谈与文献资料补充。2020—2023年期间，与县、乡、村保持沟通，及时获取最新的资料，并进行网络访谈，补充资料。

表1 主要深度访谈对象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职务
F	男	35	第一书记
B	男	48	村书记
D	女	50	普通村民
J	男	65	前任村书记
O	女	62	文化组织员、妇女主任
A	男	35	普通村民，外出务工
P	女	50	普通村民，留守村落

三、从寻找“好人”到“好人”在线

在2015年8月之前，C村治理秉持无为而治的理念（村书记B），村两委干部大部分时间在外务工，村里的公共事务处于停滞状态：村巷道路、供水设施等基础设施破损严重、年久失修，村内活动广场杂草丛生，在村民眼里，村庄处于无序状态，街道不干净，垃圾随便乱丢；邻里关系不和谐，经常发生争执。面对这样一个散漫的村落，治理的钥匙在哪里呢？好人，便是C村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过程中寻觅的治理钥匙。好人如何成为治理的钥匙呢？在C村的治理实践中，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好人评选、好人实践与好人在线。通过这三个阶段，C村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模式，延续至今。

（一）好人评选：作为符号的好人

2015年8月第一书记F和扶贫驻村工作队进入C村，与村两委干部一起，走入窑洞，

通过帮助村民干活，与村民聊天寻找治理的钥匙。在与村民的交流中，他们发现“好”这个字不停地出现，“那是个好人”“他家媳妇好得很”“他家儿子特别好”“他对老婆真好”……在频繁使用的“好”字中，“好人”这个概念浮现出来。

谁是好人？标准是什么？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与村委会拟定了一个评选标准，第一个阶段主要采用村民推荐（包括自我推荐、推荐他人）和村委会推荐两种方式，第一书记希望通过好人评选这一形式，在唤醒村内原有秩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乡村精神，“总得让村子看起来有点人气”（F，20191006）。2017年开始，C村开始举办“C村好人”评选活动，让村民学习有榜样、赶超有标兵，凝聚起学习模范、追赶模范、争当模范的良好氛围^[3]。

按照评选规则推选出来的好人，具有如下特征：敬老爱幼、维护家庭团结；独立自强、带领村民致富。“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本体，由家庭制度和户籍制度共同构成的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徐勇，2013）。因此，选出来的第一类好人与家庭关系相关联，主要特点在于：在各种困境中，维护大家庭关系。如好人韩某某，面对因脑溢血导致瘫痪在床的妻子，10年如一日心甘情愿做妻子枕边的闹钟，当妻子手里的拐杖，屋里屋外，洗衣做饭；好人席某某，为了不让奔波在外的仨兄弟分心劳累，拖着残疾的身体独自悉心照料八十高龄的母亲10年之久；好人祁某某，8年前丈夫因煤矿事故导致下肢瘫痪，家里有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她用瘦弱的肩膀毅然扛起家庭的重担。好人刘某某，她11年细心照顾半身不遂的老伴，从不言苦；好人李某某，她30年跟婆婆同吃同住，从不斗心斗嘴；好人贺某某，将儿媳妇当作亲生女儿，甘心在家张罗柴米油盐，为的是让媳妇安心工作……^[4]。在入户走访中，研究者进入了好人李某某的家里。李某某是C村的媳妇，已经70岁了，婆婆90岁了，在院子里晒太阳。她照顾婆婆30年，院子里养着牛和羊，晒着玉米棒子，十分有序。

第二类好人以个人视角为主，分为励志型、脱贫致富型和服务村落型。比如好人倪某某不等不靠不要，拖着残疾的身体坐着板凳锄地、磨面，身残志坚！好人年某某，敢想敢干，率先利用扶贫贷款建起蘑菇大棚，成为带动贫困群众发家致富的女能手；好人资某某，心间有公道，办事有尺码，哪里有矛盾，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他忙碌的身影，主动维护村里的公平正义。好人韦某某，品学兼优，自食其力，硬是凭着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打工挣钱坚持着自己的学业^[5]。

（二）好人实践：作为日常的好人

2018年C村所在县在全县推广道德银行模式。“道德银行”^[6]由组织机构、星级设置、积分超市、积分卡和存折、人员配备以及资金来源等六部分构成，主要仿照银行运行模式，以“十星农户”^[7]评选活动为载体，将村民的文明善举进行量化，兑换成积分存入“存折”，村民既可以凭借积分卡兑换所需物品，也可以在“十星农户”评选表彰

过程中获得精神奖励。其目的是探索将“道德实践”融入乡村治理中，引导群众崇德向上，用德治的力量春风化雨，营造文明淳朴乡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8]。

道德超市（也称“积分超市”）是依托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独立建设的超市。超市的物品由村委与供货商签订供货协议，供货商由乡镇筛选1—3家，由C村所在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审定备案。物品由乡镇统一标分，1积分对应1元人民币。资金来源包括县财政专项经费、村集体经济收入和社会捐助。在C村道德超市的收银台上，摆放着一个16开本的积分本，每一个村民的道德积分都用笔清晰地记录在册。研究者在积分超市里看了换购的记录，村民手写的签名清晰可见。积分超市主要有三类：厨房用品，如面粉、食用油等；生活用品，如水桶、墩布、扫帚等；服饰，如拖鞋、服装等^[9]。

首先，通过道德银行项目，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成为实实在在的公共事务活动场所。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集中学习、开展活动的主要场所，将“道德银行”设在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只要村里开展集中发分、兑换物品、表彰奖励等活动，村民都会积极参加，“以前村支部就没人，我们去了也没啥事，现在有事没事来支部坐坐，看看村里有啥大事，参加集体活动，还能收获积分”（D，20191006）。

其次，以“道德大讲堂”引导村民参与村落事务。C村是一个行政村，村落靠近公路，距离县城乘坐大巴需要20分钟，在县城务工者往返便利^[10]。C村以道德大讲堂的形式来推行道德银行项目。每半个月举办一次“道德讲堂+党课，四德教育促党建”活动。“道德大讲堂这个形式村民最容易接受，也容易形成口口相传的形式。”（F，20191007）主要有“我唱、我讲、我看、我学、我议、我诵、我行”七个环节^[11]。道德大讲堂在村级文化活动场所，集中在一个会议室进行，这个会议室平时主要举行各种文化活动、技能培训等。评选出来的好人，上台讲述自己的故事。之后，村民登台表演根据好人故事改编的文化节目，如相声和三句半。“道德大讲堂后，村民上台讲自己的思想变化，现在上台讲话的村民很多，之前谁能上台讲话？”（J，20191005）尤其是星级农户评选中，村民们都争先恐后，事先写好了演讲稿，在台上大声朗读，台下的村民边评论边鼓掌，形成了人人都想上台讲话，人人都想当好人的气氛。研究者在村民家中看到这样的演讲稿：演讲稿写在学生作业本撕下来的纸张上，纸张上的字体歪歪扭扭的，一点也不工整，内容集中叙述自己参与好人评选的事迹，参选的村民脸上带着自豪和不安，担心自己做得不够那么像“好人”。

（三）好人在线：从具身在场到虚拟传播

F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通过各种方式，将好人从熟人社会中“分离”出来，通过多种形式，好人成为在线的好人，从具身在场走向了虚拟在场。媒介既成为乡村治理的展示

平台，也成为了乡村治理的技术工具。

好人在线的实施，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在C村，村民依然习惯于身体在场的传播，面对面交流依然是重要的媒介形式。虽然C村村民外出打工的青年人很多，村里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村民依然占主导，村民之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家庭场域和村落日常生活中。在道德银行实施中，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几乎天天到村民家里，帮助村民做家务，提供政策支持和帮扶。村民经常留他们在家里吃饭。在拉近距离、融洽感情的同时，增强了村民对村落发展的信心。贫困户张某某，在驻村工作队的思想帮扶下，办理小额扶贫贷款5万元，购买了3头牛，彻底改变了“打牌从白忙到黑，坐在炕上等小康”的消极状态。张某某在2020年度被评为十星级农户，因为张某某是小学肄业，当他站在村级舞台上讲话时，对其他村民触动很大（F，20191006）。此外，通过组织文化活动促进好人评选好动。C村的文化活动在2015年之前处在瘫痪状态，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助村民们建了新的文化广场，聘请外来的艺术家教授村民广场舞、声乐、大鼓、合唱等。大约百分之九十的村民参与了文化活动，其中不少村民被评为星级农户。

在上述过程中，好人成为村落熟人社会里口口相传中的被传播者。无论是文化活动的组织还是村民家庭的信息传播，好人还只是村落的好人，保持着具身在场的属性。从2019年开始，通过村落大喇叭，网络里的歌曲通过U盘进入了村里，这些选择的歌曲将好人赋予了更为浓厚的普遍色彩，使其成为“陌生人”群体中的好人，也成为虚拟传播场域的好人。

一进C村，左边是村委会大院，村里的大喇叭就矗立在村委会大院的门口。每天早晨8点，大喇叭开始播放歌曲^[12]。这些歌声，在道德大讲堂中，被反复演唱，好人评选的过程成了好人与普通人共同走向村落公共生活的过程。

最后，网络平台成为好人在线的终极展演。C村主要以移动传播终端为主，微信平台成为好人在线最终实践的场所。这种好人在线的实践主要通过如下环节完成。第一，工作队创办了C村的新媒体平台，村里的大事小情在该平台上第一时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出来。在精心制作的各种“美篇”里，有赞扬、有说理、有态度，有村民们的故事：“C村村民自制秧歌道具”“C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参加今冬首次集体义务扫雪活动”^[13]……“美篇”成为每个村民关注村落生活的媒体窗口。“昨天出门办事忙了一天，晚上回到村里第一件事就是看我们村的微信平台，我们村发生的事情全在这上面呢。”（A，20200302，网络访谈）自打有了这个平台，村民P就把用了许多年的“老人机”换成了智能手机，用他的话说，“现在一天不看村里的微信平台，浑身就不自在”（P，20191007）。第二，村里微信群中的好人在线。F书记建了各种村里活动的微信群^[14]，F担任群主。F通过微信群发布村里的各类信息，把村里的信息传播给村落内外的村民。智能手机在C村占有率达到90%以上^[15]，因此，随着村落治理面貌的变化，“在外务工

的青年人，在城里找到了对象，原本不愿意带回村里，现在也很骄傲地带回C村”（F，20200810，网络访谈）。第三，网络为核心的信息传播与主流媒介报道。在C村治理模式的推广中，F书记作为C村代表，通过个人参与主流媒介报道的形式，将C村的治理理念传播到了各类媒体^[16]上。同时，村落开通了微信视频号，将各类媒体报道生成视频进行传播，将C村外来的各类行政视察、外来调研等活动进行报道，不间断地传播C村的治理过程和好人事件。在这个过程中，C村还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学习者和观摩者，寒暑假期间亦有大学生去C村进行调研实习，这些参观和实习也成为媒介报道影响力的延伸。

四、以“好人”再造为核心的村落治理框架

20世纪下半叶的乡村治理历史研究指出，主要有压力型体制和运动型治理两种机制（荣敬本等，1998：28；狄金华，2010：98）。21世纪以来，运动型治理模式得到更多关注，其逻辑根源在于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依赖（冯仕政，2011；王洛忠等，2007）。一方面运动式治理走向常规化（倪星等，2014），另一方面运动型治理的实践，在诸如村庄选举、社会维稳、资金动员和植树造林等事件中已得到多维度的研究（吴毅，2007；周雪光，2009；折晓叶等，2011；狄金华，2010），地方运动型治理与体制相互依存，两者共同实现了基层政府职能，达成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周雪光，2012；欧阳静，2014）。亦有一些治理机制或模式，是上述两种治理模式的实践形式和变异状态：如目标管理责任制度（王汉生等，2009）、统合型治理（张丹丹，2020）、一线治理（杜鹃，2020）、接点治理与“接点再造”（谢小芹，2016）、发展型治理策略（王思斌，2020）、“悬浮型”的治理路径（周飞舟，2006）、“三治”结合的箱式治理模式（陈涛等，2019）、韧性治理（王杰等，2021；张震等，2022；胡卫卫等，2022）等。同时，由于数字乡村的技术手段嵌入乡村社会的治理情境中，会产生乡村治理的数字负担和压力（丁波，2022）。

上述乡村治理研究框架，更多侧重乡村治理的中观维度。如果仅仅停留在该维度，就无法深入到乡村社会中的“人”这一层面上。为了突出“人”这一因素，本研究从微观出发来建立乡村治理的框架。该治理框架围绕村民展开，以“好人”为杠杆，探讨乡村治理如何借助这一杠杆，实现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融合的机制。

（一）从寻找好人到再造好人，乡村治理路径创新

从村民个体出发，以“好人”为杠杆，发掘乡村内部的治理动力，是C村主导的治理路径。对中国传统村落而言，“好人”既是一个称号，也是地方社会评价个体体系的指标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人”包括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要求个体所有类型

的交往关系中都能拥有良好的表现，从而使其交往生活的整体呈现为一种完满的状态，这种好人是抽象性的理想状态，不具有日常性的特点；第二种是特称性的“好人”观念，这种“好人”观念只要求个体在某个或某些方面达到一种“好”的状态（王江伟，2021）。对乡村社会而言，“好人”是村落熟人社会关系累积的日常生活伦理的产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对于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费孝通，1998：10）。因此，在一个村落共同体中，评选好人意味着对原有乡村秩序、原有村落习惯、风俗和传统的一种唤醒，重新“发现”好人则是对乡村秩序重塑的一种尝试。村里评选出来的好人们，并非是因为“选”才成为好人，而是因为C村的村落社会中，存在这些维护家庭秩序、村落秩序的村民，他们是乡村秩序的隐性维护者和隐性实践者，这种秩序被表面瘫痪的村落治理现实遮蔽了。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形下，乡村基层秩序仅仅维持着传统的士绅治理思维，并没有显性的村落秩序的自我生产能力。

当“好人”作为乡村基层秩序的隐性力量成为榜样的时候，对村民们凸显了一种新的村落秩序形成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通过道德银行将好人评选与村庄治理过程结合起来、使好人不仅仅是临时的“好人”，也不仅仅是习俗或传统的“好人”，“好人”更意味着一种乡村精神的挖掘，再造好人是这种乡村精神重塑的核心理念，乡村精神的重塑反过来固化了好人精神。

（二）道德银行、道德大讲堂和道德超市

道德银行是通过将道德指标与个体行为关联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中好人的道德实践，这种道德实践又与C村好人评选活动对应起来了。村民从家庭中走出来，在道德大讲堂中寻找自我；在道德超市中，获得的积分得到了物质报酬，这种物质报酬在乡村社会中，既展示了个体在村民中的威望，也呈现出村民的道德人格。通过个体参与到村落公共事务活动中，他们与村落的关系被重新定位，他们也被纳入到乡村治理的日常实践中来。通过道德银行将村民个体凝聚起来，这种凝聚力量使得村民们从村落治理的后台走到了前台。一定意义上，道德银行是传统文化的一种新面貌，从表层而言是对现有村落群体凝聚力的一种再造工程。当道德成为个体在村落的评价资源时，村落与个体同时实现了一种再造，也进入了新的村落秩序中。

（三）媒介技术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成为延伸好人在线的动力

在道德银行项目实施过程中，十星农户与道德超市的联合，衍生了村落好人的实践运作机制。在实践中发现，村民参与道德超市积分换购和星级农户评比这两项活动的积极性最高。借助媒介技术，这些“好人”走出村落，成为网络时代的“好人”在线^[17]。

在本案例中，尽管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以及县镇一级的政府协力在以科层（行政）治理的力量，试图引导村落治理的秩序。外来者作为国家制度的携带者、扩散者，

利用具身在场与虚拟传播的不同类型，挖掘和重构了乡村社会关系。在这几种关系中，外来者的组织能力和引导能力一开始十分凸显，随着治理过程的推进，治理主体成为村民。他们与外来者共同成为新社会情境的塑造者和实践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力是改变村落原有治理机制的初级动力，村民的实践是村庄新秩序再生产的持续动力，贯穿治理实践的传播手段，扮演了双重角色：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作为原有村落治理框架的外来者，强化和改变村落治理的生产能力的同时，激发了村民自我治理的主体性，二者合力重塑了乡村治理的框架。

“正因为人生下来并不是一个完全适合集体生活的动物，所以我们的集体生活不能全由本能来完成，而求之于习惯。”（费孝通，1998：190），随着乡村社会群体的不断流动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习惯会逐渐消失，文化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个体所属的文化提供了构成他生活的原始材料。如果文化极贫，个体就遭殃了；如果文化极富，个体则有幸不会错失良机”（罗伯特·芮德菲尔德，2013：231）。在C村文化传统并不丰裕的情形中，该村拓展和利用各类文化活动塑造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村落习俗，将家庭内外、村庄内外的村民联合起来，从熟人中的好人，到在线的好人，好人走出了村落，也带着C村走出了治理的困境。

简言之，在C村的案例中，作为一个符号的“好人”，是关联家户与村落之间的核心纽带；道德银行是评价“好人”的系统，道德大讲堂是村民们公开参与的竞选舞台，上述过程被展示出来，构成了C村动态的治理框架。在这个治理框架中，以“好人再造”为核心来发掘乡村活力，围绕道德银行，重塑乡村的社会关系，同时村落内外好人在线，促进了乡村振兴视角下以“再造好人”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框架的形成。

五、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型，乡村社会的治理的结构、类型与属性也在发生转移。“官僚制（科层制）乃是将共同体行动（Gemeinschaftshandeln）转化为结合体行动（Vergesellschaftung）的特殊手段。”（韦伯，2010：64）一定意义上，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科层制技术治理逐渐调试社会经济生活具体经验和问题的历程（渠敬东等，2009），也是科层组织再造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金江峰，2020），当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呈现出了“科层制为体—整体性治理为用”的模型（陈丽君、童雪明，2021）。对中国乡村社会而言，共同体行动转化为结合体行动还处在一个动态过程中，不同的地域与村庄类型，使得不同村庄的治理类型有较大的差异，无论是科层制度带来的支配性，还是行政对治理的吸纳，以及媒介作为技术在治理中的渗透，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属性，在上述治理框架的基础上，以下问题值得继续探讨。

首先，好人治理框架的运动性特点如何转化？换言之，如何使其摆脱运动属性，成

为一种常规治理形式？

如前所述，村民主体治理能力的拓展是乡村振兴中村落治理秩序重构的核心。在本文提出的框架中，依然具有村落内部运动型治理的属性。研究指出，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是将行政权力集中与强激励兼容在一起的一种治理政府官员的模式，其强激励本身内生出一系列的负作用（周黎安，2007），但基层运动型治理机制并非官僚制常规机制的代替机制，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基层政府运行。基层运动治理是官僚制内部的一种行政机制，几乎与社会大众无关（欧阳静，2014）。在本案例中，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在农村实施的治理一定意义上属于基层的运动型治理类型，但其核心是动员个体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随着时间推移，每个村民都有多重行动的可能性，这种治理的最终效应是依靠作为行动者的每一个村民来实践的。村民“一方面在利用各种策略努力将自身的被动与劣势转化为主动和优势，同时也在防范自身的优势处境和主动性转变为某种威胁和被动”（王汉生等，2009）。由此维持了村民作为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位置。但是，村民多重行动的可能性，如何延续并转化为真正的乡村自治力量，还需要对村落的内在发展系统与外在维度对村落影响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此外，而作为这种新的村落秩序之基本动力的道德银行，在未来的村落新秩序中又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关涉乡村振兴下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塑与整合，还需要更多的反思与实践论证。

其次，是技术吸纳了行政，还是行政拓展了技术？

新媒体技术及其相关的数字技术结合，形成了技术吸纳行政、行政拓展技术的治理特点（李汉卿，2019），强化自上而下的信息收集能力是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议题（王雨磊，2016）。从治理场景视角而言，国家是通过单一的科层—行政技术来开展不同场景的治理活动的，基层治理会出现过分考虑治理技术和行政效率而不顾政治原则和社会有效性的趋势（吕德文，2019；赵玉林等，2020）。具体研究指出新媒体参与精准扶贫有四种路径：即“信息—传导”路径、“引导—激发”路径、“监督—反馈”路径、“嵌入—搭建”路径（曾润喜、乔阳阳，2020）。对于本研究而言，仅仅将媒体视为一种治理过程的参与者并不符合乡村当下的现实。就行政治理而言，数字技术的扩散与日常化使用虽然已经成为一种治理现实，但是行政与技术之间的拓展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材料来补充论证。

注释：

- [1] 这里的媒介指宽泛意义的媒介，包括面对面信息交流、网络信息交流与人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
- [2] 耕地面积1836亩，人均耕地面积1.5亩，且多为坡耕地，加全年无霜期较短，玉米等传统作物产量不高，核桃、苹果等经济作物成活率较低，村民仅靠农业收入难以维持生计。资料来源：《C村2019年脱贫攻坚总结报告》。
- [3] 资料来源：《2017年C村道德银行实施方案》
- [4] 资料来源：《2018年C村好人评选案例》。
- [5] 资料来源：《2019年C村好人评选案例》。
- [6] 道德银行的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扶贫开发思想为指导，以“倡导道德风尚、弘扬新风正气、优化村风民风、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思想先导、群众主体、环境创优”的工作思路，以开设“道德银行”、开办“+能量”超市、评选“十星农户”为抓手，做好“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同步发展，引导全体村民讲道德、讲奉献、学技能、学政策、爱环境、爱公益、守孝道、守规矩，全面提高全体村民的道德文明素质，激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资料来源：《C村2018道德银行实施方案》。
- [7] 全县设立了10个“基本星”，简称“十星农户”，即政策明白之星、勤劳创业之星、孝老爱亲之星、团结互助之星、卫生整洁之星、文体活跃之星、热心公益之星、诚信正义之星、移风易俗之星、绿色生态之星。在不同的村落落实之后，根据各村落的情况，做了修改。村党支部书记全面负责本村“道德银行”建设（但在C村主要还是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负责这项工作），C村配备“四大员”，即评分员、评星员、记账员和超市管理员。
- [8] C村所在县政府于2018年5月5日下发《关于在农村深入开展“道德银行”建设的实施方案（试行）》的文件，使得这项工作有了一整套规范的运行机制、专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全县“道德银行”工作推进会暨培训会，又于6月12日进行全县观摩，九个乡镇进行打分排名，不断修正经验，补充不足。
- [9] 与超市的管理人员交谈得知，一开始道德超市的积分以纸质版为主，后续为了资料汇总方便，就改为电子记录和纸质记录同步使用，村民主要使用签名的方式记录，管理者则将纸质版录入电脑。
- [10] C村所在的县规定：县域内的公共交通和公共教育全部免费。
- [11] 资料来源：《C村2019年脱贫攻坚总结报告》。
- [12] “驻村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掏腰包购买了一面红旗，高高挂在村委会大院，从网络上下载了近百首红歌，组织村民将一根闲置多年的电线杆竖立在村委会院里，修好了已经坏了多年堆在库房的大喇叭，每天轮流放红歌，其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三首歌，每天首放，每天必放。这样可以提升村民的精气神和村庄的活力。”（F，20191009）
- [13] 来自于C村的美篇2019年10月9日。
- [14] 微信群有村民群、村两委群、村党员群、村文化活动群、村电商群、村义务劳动群等。
- [15] 笔者在C村时遇到一位90岁的村民，他坐在门口，拿着手机，用微信语音在微信群里唱歌。
- [16] 报道该村的主流媒体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地方报刊、地方广播、县级融媒体中心等。
- [17] 这里的好人在线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指对于村落内部而言，好人“凸显”出来成为榜样，另一个是指对于村落外部而言，好人通过在网络和媒体上被报道、被呈现，成为村落外部世界关注的对象。

参考文献：

- 艾塞林,杨中兴(1993).技术社会的时间与空间[J].国外社会科学信息(9):29-32.
- 陈丽君,童雪明(2021).科层制、体性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J].政治学研究(1):90-103+157-158.
- 陈涛,李华胤(2019).“箱式治理”: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边界与实践效应——以湖北省京山市乡村振兴探索为例[J].探索(5):107-115.
- 狄金华(2010).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J].社会(3):83-106.
- 邓大才(2018).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选择与组合——以乡村治理体系为研究对象[J].社会科学研究(4):32-38.
- 董磊明,欧阳杜菲(2020).乡村场域中社区性治理与技术性治理的整合机制研究[J].社会学评论(6):69-82.
- 董磊明,欧阳杜菲(2023).从简约治理走向科层治理:乡村治理形态的嬗变[J].政治学研究(1):133-146+160.
- 丁波(2022).数字赋能还是数字负担: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及治理反思[J].电子政务(8):32-40.
- 杜鹏(2020).一线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调整与实践基础[J].政治学研究(4):106-118+128.
- 费孝通(1999).乡土重建[A].费孝通文集(第四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
- 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冯仕政(2011).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J].开放时代(1):73-97.

- 胡卫卫, 陈建平, 赵晓峰(2021). 技术赋能何以变成技术负能? ——“智能官僚主义”的生成及消解[J]. 电子政务(4):58-67.
- 胡卫卫, 李一凡, 豆书龙(2022). 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运行机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59-67.
- 贺雪峰, 董磊明(2005). 中国乡村治理: 结构与类型[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3):42-50+15.
- 何绍辉(2018). 从“技术”到“伦理”: 精准扶贫研究的范式转换[J]. 求索(1):141-147.
- 黄仁宇(1997). 万历十五年[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黄振华(2018). “家国同构”底色下的家户产权治理与国家治理——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认识[J]. 政治学研究(4):37-47+126.
- 黄月琴(2015). “弱者”与新媒介赋权研究——基于关系维度的述评[J]. 新闻记者(7):28-35.
- 黄晓春, 嵇欣(2016). 技术治理的极限及其超越[J]. 社会科学(11):72-79
- 黄宗智(2000). 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
- 金江峰(2020). 乡村政策动员中的“权力—技术”及其影响[J]. 中国农村观察(2):134-144.
- 孔文豪, 吴佳宜, 黄思颖(2021). 数字鸿沟与相对剥夺感: 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J]. 电子政务(1):110-124.
- 李红艳(2021). 新媒体技术助力乡村治理[J]. 人民论坛(1):69-71.
- 李汉卿(2019). 技术吸纳政治: 自媒体时代政务微信的功能与限度——以上海发布为例[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110-119.
- 吕德文(2019). 治理技术如何适配国家机器——技术治理的运用场景及其限度[J]. 探索与争鸣(6):59-67+158.
- 刘永谋(2016). 技术治理的逻辑[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6):118-127.
- 罗伯特·芮德菲尔德(2013). 农民社会与文化[M]. 王莹, 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马克斯·韦伯(2010). 支配社会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倪星, 原超(2014). 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2):70-96+171-172.
- 欧阳静(2014). 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J]. 开放时代(6):180-190+9.
- 渠敬东, 周飞舟, 应星(2009).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6):104-127+207.
- 荣敬本, 崔之元等(1998). 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 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沈费伟, 陈晓玲(2021). 保持乡村性: 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J]. 电子政务(3):39-48.
- 谭九生, 任蓉(2017). 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创新[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30-37.
- 王汉生, 王一鸽(2009). 目标管理责任制: 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J]. 社会学研究(2):61-92+244.
- 王宏新, 付甜, 张文杰(2017). 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3):48-53+129.
- 王杰, 曹兹纲(2021). 韧性乡村建设: 概念内涵与逻辑进路[J]. 学术交流(1):140-151.
- 王江伟(2021). 论“好人”观念[J]. 伦理学研究(4):54-59.
- 王洛忠, 刘金发(2007). 从“运动型”治理到“可持续型”治理——中国公共治理模式嬗变的逻辑与路径[J]. 未来与发展(5):54-58.
- 王思斌(2020). 全面小康社会初期的相对贫困及其发展型治理[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5-13.
- 王晓毅(2020). 精准扶贫如何改变乡村治理结构[J]. 文化纵横(3):98-106+143.
- 王雨磊(2016). 数字下乡: 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J]. 社会学研究(6):119-142+244.
- 武小龙(2022). 数字乡村治理何以可能: 一个总体性的分析框架[J]. 电子政务(6):37-48.
- 肖瑛(2014). 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 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J]. 中国社会科学(9):88-104+204-205.
- 许晓(2022). 从结构断裂到“双轨一体”: 第一书记制度下的乡村治理变迁——基于鲁西北D村驻村帮扶的个案研究[J]. 求实(2):67-83+111.
- 徐勇(2013). 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 中国社会科学(8):102-123+206-207.
- 荀丽丽(2017). 从“资源传递”到“在地治理”——精准扶贫与乡村重建[J]. 文化纵横(6):66-73.
- 谢小芹(2016). “接点治理”: 贫困研究中的一个新视野——基于广西圆村“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基层实践[J]. 公共管理学报(03):12-22+153.
- 杨雪冬(2012). 压力型体制: 一个概念的简明史[J]. 社会科学(11):4-12.
- 赵玉林, 任莹, 周悦(2020).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数字治理——基于30个案例的经验分析[J]. 电子政务(3):100-109.
- 张丙宣, 任哲(2020). 数字技术驱动的乡村治理[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62-72.
- 张丹丹(2020). 统合型治理: 基层党政体制的实践逻辑[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17-24.
- 张国磊, 张燕妮(2021). 农村基层治理: 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J]. 理论与改革(2):87-99+153-154.
- 张震, 唐文浩(2022). 韧性治理共同体: 面向突发公共风险的乡村治理逻辑[J]. 南京社会科学(10):54-62.
- 郑文宝(2022). 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路向分析——一种宏观视角的审视与判断[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58-65.
- 周常春, 刘剑锋, 石振杰(2016). 贫困县农村治理“内卷化”与参与式扶贫关系研究——来自云南扶贫调查的实证[J]. 公共管理学报(1):81-91+156-157.
- 周飞舟(2006). 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 社会学研究(3):1-38+243.
- 周飞舟(2018). 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J]. 社会学研究(1):41-62+243.
- 周飞舟, 谭明智(2020). “责任到人”的治理机制及其作用——以脱贫攻坚战为例[J]. 学海(3):49-58.
- 周黎安(2007).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7):36-50.
- 朱政(2022).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探索——以“积分制”治理为素材[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71-78.

- 曾润喜, 乔阳阳 (2020). 新媒体参与精准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J]. 出版广角 (22) :9-22.
- 周雪光 (2012). 运动型治理机制: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 开放时代 (9) :105-125.
- Correa, T. (2017). Digital Inclusion in Rural Areas: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Challenges Faced by People from Isolated Communiti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2(3), 247-263.
- Correa, T., Pavez, I., & Contreras, J. (2017). Beyond Access: A Relational and Resource-based Model of Household Internet Adoption in Isolated Communitie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41(9), 757-768.
- Onitsuka, K., Hidayat, A., & Huang, W. (2018). Challenges for the Next Level of Digital Divide in Rural Indonesian Communities.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84(2), e12021.
- Park, S., Burford, S., Nolan, C., & Hanlen, L. (2016). The Role of Digital Engagement in the Self-management of Type 2 Diabetes. *Health Communication*, 31(12), 1557-1565.
- Salim, A. (2013). Management Information in Rural Area: A Case Study of Rancasalak Village in Garut, Indonesia. *Procedia Technology*, 11, 243-249.

JOURNALISM RESEARCH

VOLUME 214, NO. 2, 2024

1 From Embodied Presence to Virtual Communication: Proposing a Framework of Rural Governance

· *LI Hong-yan*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the era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s also begun. During this process, which path constructing different village governing paths for different villages is one of the core el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selects a traditional mountain village in southeastern Shanxi as a case, conducts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ocial context, specific events, and technical behavior as the basic elements, and constructs a governance model that rebuilds good people with reshaping the rural spirit as the core. Finally, the issues of moral banking and rural order,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and technical governance, and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rural governance related to this governance model are discussed.

[Keywords] recreating good people; virtual communication; embodied presence; rural governance

14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Relation Reconstruction in the Mediated Urban-rural Life World—A Study of Short-video Creation of Returning You

· *ZHANG Jie, LUO Mi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t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returning youth reconstruct daily life world and Urban-rural interaction through short-video creation and what the role of them as well as the media logic in this proces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young people returning home rebuilding their life world by becoming a rural uploader, they construct an intermediate landscape in short videos, which is like neither the urban life world nor the rural life world. Based on this "intermediary landscape", they aim to build a mediatized life worl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hich can be realized is